

文化、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文献综述

江春 许立成*

摘要:近年来文化在经济金融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本文对国内外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做一个全面的回顾、总结和评述。在文化的视野里,价值观、信任、宗教等文化因素不仅规范着社会的经济金融行为,而且还是影响经济金融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不仅得到理论的证明,还受到经验研究的支持。儒家文化虽然在经济金融发展中的作用备受争议,但儒家文化对中国乃至东亚的经济金融发展模式都有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文化 金融发展 经济增长

经济金融发展问题是经济学中最古老也是最重要的问题。但是深一层的问题是:为什么有的国家经济增长比较快,金融体系也比较发达,而有的国家则没有?很多学者从文化这一独特的视角来理解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本文试图对这方面的文献进行归纳和总结,并给出简要的评述。

一、文化的概念:一个经济学的视角

文化一词,西文源于拉丁文字 cultura,本意为土地耕耘和作物培育,后来用于人类自身的心灵、智慧、情操和德行的培养教育等一切精神活动乃至全部社会生活内容。目前文化的概念主要集中在人类学和社会学上,认为文化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以及其他人类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种种能力、习性在内的一种综合体,文化的核心是传统的观念及其带来的价值。

近年来,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安排,也受到了经济学家的重视。哈耶克(1976)认为,文化既不是自然的也不是人为的,既不是通过遗传继承下来的也不是经由理性设计出来的,文化是一种由习俗的行为规则构成的传统,是逐渐演化而形成的,并且竞争在文化进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复杂文化形态的形成往往是一种优胜劣汰的结果。Fukuyama(1995)认为,文化作为继承而来的伦理习俗,它是源于规范成员行为的伦理法则、制度、宗教和传统。虽然具有不同程度的理性,但它不是人们理性选择的结果,而是传统影响和教育的结果,并与经济人的算计无关。他还进一步指出,作为伦理习惯的文化,有的具有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有些则不具有。具有经济价值的文化习俗称为美德,并且这种美德可分为个体性品德和社会性品德,个体性品德是指个人能完成的文化习俗,如节俭、努力、敢于冒险、富于理性和开拓精神等;社会性品德指需要通过人与人之间关系才能完成的文化习俗,如诚实、合作、责任感等,它具有社会性,被称之为社会资本。Guiso、Sapienza和 Zingales(2006)认为,文化是指社会世代传承下来的具有持久生命力的宗教、习俗、价值、道德伦理等。文化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主要是文化对人们的预期和偏好有着直接的作用,而预期和偏好通过影响经济主体的行为从而对经济金融绩效产生影响。

二、文化、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研究

在现有理论研究中,对文化与经济金融活动关系的分析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讨论文化在经济金融活动中的规范、引导和执行的作用。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

* 江春,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邮政编码:430072;许立成,江苏银监局,邮政编码:210004,电子信箱:xulicheng227@163.com。

的研究》(1776)和《道德情操论》(1759)中,就强调了价值、宗教等文化因素在人们经济金融活动中的作用,他认为,“经济人也要遵守社会正义,要有社会同情心,要具有勤勉、节约等品格。穆勒(1890)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认为,道德、心理和习俗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信仰对经济活动有很大的作用。他还认为,对于劳动效率,劳动者的道德品质与智力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特别是信任对社会的影响是深远和多方面的。马歇尔(1890)在《经济学原理》中认为,在人们的经济活动中,不仅要考虑经济动机,也要考虑到个人的道德和理想。马歇尔还强调了宗教改革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他认为英国人所具有的庄重精神使他们容易接受宗教改革,从而容易诱发工业革命。Greif(1997)从文化信念与社会组织和制度安排的角度解释了文化和经济活动的关系。他认为,在缺少集中法律体制的条件下,信用关系能够带来契约的实施和解决交换问题,从而使经济金融交易成为可能。他还指出,过去的行为、文化信仰、社会结构和组织都影响着价值观念和社会实施机制的发展,从而使制度结构表现出路径依赖的特征。陈志武(2005)分析了文化在经济金融活动中的执行作用,他认为,经济金融合约的执行机制主要有两种,一是以法律为代表的外部显性执行机制,二是以文化为代表的内部隐性执行机制,“文化是一个因经济需要而内生的隐形合约执行机制。”他特别指出,在中国传统金融不发达的条件下,后代作为父母养老金、保险金、信贷这种隐性金融合约主要依靠内疚等(属于文化范畴)来执行,而中国家族文化中的血缘关系能够很好地帮助这些金融合约在家族这个隐性的金融交易市场中得到执行。

二是分析文化这个独特的因素在经济金融增长中的作用。马克思·韦伯(1930)在这方面具有开创性的贡献,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指出,文化对资本主义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由宗教改革而衍生出来的以禁欲苦行为特征的新教,使西欧社会克服了传统资本主义,并且它所传播的理性文化价值有利于市场机制的健全和完善,使清教徒更易于接受专门技术学习和从事工业与商业工作,同时,新教所提倡的“天职”观念中勤勉、纪律、克己、节俭等品质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所要求的储蓄、投资、人力资本、企业活动是相容的,而这些因素不仅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还能够以一种价值合理的行动“创造”出了资本主义。阿瑟·刘易斯(1955)在《经济增长理论》中也分析了文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由于习俗、禁忌和宗教信仰的不同将带来不同的工作态度,从而将带来不同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依赖于人们对工作、财富、节俭、生育子女、创造性、陌生人和冒险等等的态度。”诺斯(1990)指出,文化因素可以通过制度环节影响经济绩效。他认为一个社会的历史传统、价值观念及行为习惯等作为非正式制度约束的文化影响着经济制度的选择与变迁过程。一次正式制度的变迁能否取得预期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正式制度的变迁和非正式制度演变在方向上的一致性和相容程度。只有正式制度约束与文化等非正式约束具有相容性,才能实现制度均衡,否则容易导致“制度畸形”,出现社会摩擦、动荡。因此作为社会所共同具有的价值观和意识体系,文化的演进直接影响到正式制度变迁成功与否,从而影响一国的经济绩效。Zak和Knack(2001)通过一般均衡增长模型来分析信任、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经济主体交易时面临道德风险,往往只信任与他曾经交易过的人,因此社会的信任水平越低,投资率将越低,从而经济增长就会越差。Kanas和Stephanotis(2005)进一步模型化了文化、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文化是经济繁荣的发动机和金融发展的关键因素,道德感越强的社会文化环境,则越有利于形成保护产权的法律制度,越有利于创新,从而经济增长率越快,人均收入水平越高,金融体系也更发达。

三、文化、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经验研究

很多学者从经验的角度研究了文化、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析不同的价值观、信任水平和宗教信仰对经济金融发展的影响。

(一)文化与经济增长的经验研究

一是价值观与经济发展。Banfield(1958)首先从文化价值观的因素来解释经济发展差异,他通过对意大利各个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的研究,认为意大利南部的不发达主要是因为当地居民过分地追求狭窄个人利益的“无道德家庭主义”。Femández和Fogli(2005)在对妇女劳动生产率的研究中发现,即使控制妇女工作经验、个人特征、家庭背景等因素后,文化中价值观因素仍然在劳动生产率中起着重要的作用。Tabellini

陈志武:《金融技术、经济增长与文化》,载《经济导刊》,2005(5)。

阿瑟·刘易斯(1955):《经济增长理论》,中文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2005)利用欧洲地区数据研究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他将文化理解为个人的价值观和信念,如对他人的信任和尊重程度及个人决定中的自信程度等因素。然后他通过教育和历史政治制度这两个代理变量来衡量这些文化价值观因素。他的研究发现,在文化价值观中,自信程度越高、相信自己的努力、很少顺从的价值观有利于经济增长。

二是信任与经济增长。Fukuyama(1995)的研究发现,在高信任文化的社会,如美国、日本和德国,往往拥有大型的私人企业,经济比较发达。在低信任文化的社会,如中国和法国,其私人企业主要是小型家族企业。全面缺乏信任文化的社会,如南部意大利和美国黑人社区,则往往是一个贫穷社会。Knack和 Keefer(1997)的研究发现,在高信任的社会,由于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从而有利于鼓励投资,提高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促进经济增长。La Porta, Lopez - de - Silanes、Shleifer和 Vishny(1997)考察了信任与大型组织的关系,研究发现,信任程度越高,则司法效率越高,公民参与公共活动的积极性越大,公司的经营绩效越高,基础设施的质量以及充足性越好,通货膨胀率越低,经济增长水平越高。Guiso, Sapienza和 Zingales(2004b)在研究中发现,信任对于两国的经济交易有着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在贸易、有价证券投资 and 外国直接投资等活动中。

三是宗教信仰与经济发展。Barro和 McCleary(2003)利用国际宗教调查数据分析了礼拜活动、宗教信仰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既定宗教信仰的条件下,礼拜次数和经济增长存在着负相关关系,因为宗教部门消耗了经济资源。而在既定礼拜次数的情况下,宗教信仰会促进经济增长,因为宗教影响了个人的行为和品德,如诚实、节俭、敬业精神以及对陌生者的开放等。Guiso, Sapienza和 Zingales(2003)利用世界价值调查数据来研究宗教信仰与人们经济态度的关系,他们发现,一般来说宗教信仰有利于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的提高,但是有宗教信仰的人容易产生种族歧视,在社会中更加不宽容,对妇女的地位更加保守,但这些影响在不同的教派是不同的,并且与该宗教是否在社会中具有主导地位是相关联的。总的来说,基督教对经济的态度比较有利于经济增长,而伊斯兰教则相反。

(二)文化与金融发展的经验研究

一是信任与金融发展的关系。Calderón, Chong和 Galindo(2001)利用跨国数据考察了信任和金融结构、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研究表明,即使在考虑了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以及法律制度等因素后,信任都与金融发展和效率密切相关。信任水平越强,则金融深化程度越高,股票市场和信贷市场越发达,金融发展效率也越高。Guiso, Sapienza和 Zingales(2004a)根据意大利不同地区信任差别非常大的特点,利用家庭和企业的微观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在市场主体之间存在高信任度的地区,个人家庭部门更多地投资于股票而非大量持有现金,更容易得到金融中介机构的正规信贷以及对非正式信用使用的更少。同时,高信任度地区的企业往往具有多样性的股东,更容易获得银行信贷。特别是在法律执行机制比较弱和教育不发达的地区,信任的金融效应就越强。Guiso, Sapienza和 Zingales(2005)考察了信任与股票市场的关系,他们认为对股票风险的认识不仅与股票的客观特点有关,也与投资者的主观因素相联系。他们利用荷兰和意大利的微观数据和跨国数据研究发现,在缺乏信任的环境下人们将不参与股票市场,并且个人和国家的信任程度的差异也能够解释为什么有的人和国家乐于投资股票,而有的人和国家很少参与股票市场。同时,他们还认为,利用信任的观点还可以解释现实中股票市场参与之谜,如种族因素对股票市场参与度的影响,美国富人中不投资股票市场比例的决定等。陈雨露和马勇(2008)的实证研究也发现,社会信用文化对金融体系的效率和金融体系结构的选择具有重要影响,并最终影响到金融业的运行效率。

二是宗教信仰与金融发展的关系。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由于各自的教义所蕴涵的内容不同,从而对金融发展产生了不同作用。例如伊斯兰教严禁高利贷,反对支付或收取任何形式、任何用途的利息,从而导致信仰伊斯兰教的地区金融发展很缓慢。Stulz和 Williamson(2003)具体分析了宗教等文化因素对作为金融发展代理变量的法律制度的关系。他们所进行的跨国经验研究表明,在债权人的权利保护方面,一国的宗教信仰比法律起源、经济的开放程度、语言等因素影响更大,不过一国对外贸易的开放度能够缓和宗教对债权人权利保护的负面影响。在信仰天主教的国家中,国际贸易越发达,对债权人的权利保护就越强,从而金融发展就越快。但是在股东权利保护方面,宗教的影响因素并不大。同时,他们还分析了文化与法律执行效率之间的关系,发现宗教同法律的执行效率也存在着密切的相关性,相对于信仰其他宗教的国家,天主教国家,特别是在讲西班牙语的天主教国家,法律执行质量一般比较差,从而金融发展水平比较低。但 Herger, Hodler和 Lobsiger(2007)的跨国实证研究发现,相对于开放和制度等因素,文化对一国资本市场

发展的影响并不大,但是文化中的宗教和种族因素通过影响制度的质量从而对金融发展有间接的影响。

四、儒家文化与经济金融发展

近年来,儒家文化的复兴已成为中国的一个文化潮流,但是对于儒家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在学术界一直有争议。如韦伯(1930)认为,中国的儒家文化中,城市没有自治地位,政治重心在皇都,缺乏理性的会计制度和企业组织,社会将资金用于购买土地而不是投资于商业,士大夫阶层的“犯商业”文化,这些因素都阻碍了企业家精神的传播,从而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但是随着亚洲经济的崛起,特别亚洲“四小龙”经济奇迹的出现,人们开始强调儒家文化在亚洲经济崛起中的作用。如森道通夫(1986)分析了儒学对日本经济成功增长的作用,认为日本工业化的成功得益于西方国家的技术和日本化的儒家伦理,特别是儒家文化的节俭观,由此提供了经济增长所需的资本积累。总的来说,儒家文化有利于经济发展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儒家文化作为社会的共同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它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鼓励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积极开拓,有所作为;二是儒家文化中注重“礼治”的作用,用礼来节制人的欲望、规范人的行为以及协调社会关系,它所倡导的忠诚、责任感和集体主义精神有利于实现社会和经济的协调发展;三是儒家文化中提倡节俭储财,反对恣意挥霍奢侈,这有利于增加社会储蓄,而高储蓄率是东亚经济腾飞的重要因素;四是儒家文化中倡导学习,重视教育,提倡勤勉,强调劳动是享受的前提,有利于增加社会的人力资本,为经济发展提供丰富的劳动力资源。

到20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使人们开始重新反思儒家文化在经济中的作用。顾肃(1999)认为,东亚金融危机的根源就在于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东亚文化。在儒家文化的经济中,往往缺乏普遍权利意识和公正透明的经济秩序,并且容易带来一元化的思维模式与缺乏制约的权力结构相结合,从而产生了特殊的政治文化,如政府官僚对经济的主观随意干涉,滋长严重的政治腐败、泡沫经济和金融无序,政治上的准家族统治、虚假民主和官商结合,裙带资本主义。这些都容易带来风险意识淡薄,不遵守信贷规则,这也是导致20世纪90年代东亚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因素。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人们又开始重新审视儒家文化与中国经济金融发展的关系。Franklin Allen, Qian Jun和 Qian Meijun(2005)研究发现,在中国文化中对关系特别是家庭关系的重视,不仅有利于消除人们之间的不信任,而且有利于降低人们之间的交易成本,特别重要的是,在中国对家庭关系的重视对于减轻企业的融资障碍有着重要的作用。林毅夫(2003)认为,中国以儒家哲学为基础的传统文化,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吸收和充实的,从而使文化与经济基础能够协调起来,并且从东亚的经验来看,儒家文化也是有能力随着经济基础的发展而产生与其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陈志武(2007)系统地分析了儒家文化和金融的关系,他认为在中国古代社会,在没有市场提供的保险以及其他金融品种的前提下,“养子防老”是最主要的规避未来风险的手段,以“孝文化”和“家文化”为核心的儒家文化体系能够降低这些隐形利益交易的不确定性,增加交易安全,成为作为投资者的长者能有回报的文化制度保证。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们温饱问题的解决,经济发展的重点是要解决好未来的生活问题,要规避各类未来风险,而这些都是金融的核心功能。因此,基于金融市场与法治的体系将最终取代传统家庭加儒家文化的社会体系。

五、结论及进一步研究方向

本文全面总结了国内外学术界有关文化与经济金融增长的理论和经验研究,并着重分析了儒家文化与经济金融发展的关系,从而为研究经济金融发展规律提供了新视角及新的研究思路。在文化与经济金融发展关系的研究中,对以下方面还可以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一是利用经济学的原理来分析和解释文化的发展和演变。目前,对文化发展和演变的解释主要集中在人类学和社会学。但文化的演进无疑也受到经济法则的影响,如经济学中的竞争机制、成本收益机制。但这些经济规律如何具体影响文化的发展和演进还需要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

二是对文化与经济金融发展之间关系进行更为全面的实证研究。目前,在文化与经济金融发展关系的实证研究中,主要侧重对文化某一方面进行研究,而没有进行综合研究。因此,如何构建综合性数据库,从价值观、信任、宗教等视角来综合分析文化对经济金融发展的影响,将是我们需要进一步考虑的问题。

三是对儒家文化与经济金融发展的关系进行更为深入的考察。目前,儒家文化在经济金融发展中的作用争议很大,但儒家文化对中国乃至东亚经济金融活动有重大影响却毋庸置疑。因此,如何从历史的视角更

为仔细地剖析儒家文化在经济金融活动中的作用,促进儒家文化与现代经济金融发展的相容性,将是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参考文献:

1. 陈志武:《对儒家文化的金融学反思》,载《制度经济学研究》,2007(2)。
2. 陈志武:《金融技术、经济增长与文化》,载《经济导刊》,2005(5)。
3. 陈雨露、马勇:《社会信用文化、金融体系结构与金融业组织形式》,载《经济研究》,2008(3)。
4. 顾肃:《对东亚金融危机的文化反思》,载《中国社会科学》,1999(3)。
5. 高波、张志鹏:《文化与经济发展:一个文献评述》,载《江海学刊》,2004(1)。
6. 林毅夫:《经济发展与中国文化》,载《战略与管理》,2003(1)。
7. 欧阳为民:《儒家文化与中国经济》,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5。
8. 亚当·斯密(1776):《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文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9. 亚当·斯密(1759):《道德情操论》,中文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10. 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文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11. 马歇尔(1890):《经济学原理》,中文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12. 阿瑟·刘易斯(1995):《经济增长理论》,中文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13. 马克斯·韦伯(1930):《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文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
14. 哈耶克(1976):《哈耶克论文集》,中文版,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
15. 道格拉斯·诺斯(1990):《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文版,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16. 森道通夫:《日本为什么成功》,中文版,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17. Allen, Franklin; Qian, Jun and Qian, Meijun, 2005. "Law, Fin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Vol 77(1), pp. 57 - 116
18. Banfield, E., 1958. *The Moral Basis of a Backward Society*. New York: Free Press
19. Barro, Robert J. and McCleary, Rachel M., 2003. "Religion and Economic Growth across Countr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68(5), pp. 760 - 781.
20. Calderón, César; Chong, Alberto and Galindo, Arturo, 2001.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Links with Trust: Cross - Country Evidence" No. 4251, RES Working Papers from Inter - 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Research Department
21. Fernández, Raquel and Fogli, Alessandra, 2005. "Culture: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Beliefs, Work, and Fertility" NBER Working Paper, No. 11268
22. Fukuyama, Francis, 1995. *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 New York: Free Press
23. Greif, Avner, 1997. "Microtheory and Recent Development in the Study of Economic Institutions through Economic History" in David M. Kreps and Kenneth F. Wallis, eds., *Advances in Economic The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Vol 2, pp. 79 - 113.
24. Guiso, Luigi; Sapienza, Paola and Zingales, Luigi, 2003. "People's Opium? Religion and Economic Attitude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Vol 50(1), pp. 225 - 282
25. Guiso, Luigi; Sapienza, Paola and Zingales, Luigi, 2004a. "The Role of Social Capital in Financial Develop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4(3), pp. 526 - 556
26. Guiso, Luigi; Sapienza, Paola and Zingales, Luigi, 2004b. "Cultural Biases in Economic Exchange" NBER Working Paper, No. 11005.
27. Guiso, Luigi; Sapienza, Paola and Zingales, Luigi, 2005. "Trusting the Stock Market" University of Chicago, Mimeo
28. Guiso, Luigi; Sapienza, Paola and Zingales, Luigi, 2006. "Does Culture Affect Economic Outcome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20(2), pp. 23 - 48
29. Herger, Nils; Hodler, Roland and Lobsiger, Michael, 2007. "What Determines Financial Development? Culture, Institutions, or Trade" NCCR Working Paper, No. 2007/05.
30. Kanatas, George and Stefanadis, Chris, 2005. "Culture,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ALBA Working Paper, April
31. Knack, Stephen and Keefer, Philip, 1997. "Does Social Capital Have an Economic Payoff? A Cross - country Investigation"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12(4), pp. 1251 - 1288
32. La Porta, Rafael; Lopez de Silanes, Florencio; Shleifer, Andrei and Vishny, Robert, 1997. "Trust in Large Organiza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7(2), pp. 333 - 338
33. Stulz, Rene M. and Williamson, Rohan, 2003. "Culture, Openness, and Financ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Vol 70(3), pp. 313 - 349
34. Tabellini, Guido, 2005. "Culture and Institution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Regions of Europe" IGER Working Paper, No. 292
35. Zak, Paul and Knack, Stephen, 2001. "Trust and Growth" *Economic Journal*, Vol 111(470), pp. 295 - 321.

(责任编辑:陈永清)